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与分类

一、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美三洲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在政治上走向独立，在经济上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谋求发展，从而在世界上出现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般是指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现在已取得政治独立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在目前的发展文献中，把现阶段尚处于贫穷落后或不发达状态，并正进行经济发展和较大程度提高实际收入水平，以摆脱相对不发达状态的国家（相对于现阶段已实现工业化的工业发达国家来说），统称为“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或“欠发达国家”（Less-developed Country, LDC）。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共有100多个，大约占世界人口3/4以上。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具体国情不同，各自有其相异之点，在历史文化、国土大小、人口多寡、资源条件、产业结构、收入水平、生态环境、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等方面都互不相同。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和发展问题。依照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可分为六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低生活水平；

（2）低生产力水平；

（3）高人口增长率和高抚养负担；

（4）越来越多的失业和就业不足；

（5）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生产及初级产品出口；

（6）国际关系中的劣势、依赖和脆弱性。

如果将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社会经济特征加以归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生产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

发展中国家家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在一些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人均资源拥有量也少、管理水平低，并受制度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特别是由于人口压力和经济增长缓慢，使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就业机会不足。加上偏好资本要素，教育与经济需要脱节以及工资缺乏刺激等偏差，使不充分就业、隐蔽失业和公开失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二）人均收入低，贫富差距大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减轻或逐步消除贫困，然而，收入水平低下，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始终是发展的主要障碍。

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收入低，和发达国家相比，国内贫富悬殊也较大。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外，发展中国家由于财产、土地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加上税制不完全，社会保障制度缺乏，贫富差距相对较大。一般地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无论是和自己国内少数富裕阶层相比，还是和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民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都是低下的。低下的生活水平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质量上，诸如普遍贫困，收入低下，住房短

缺，健康不良，教育落后，婴儿死亡率高，预期寿命和工作年限短等等。托达罗根据大量的统计资料，对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水平状况作了几点归纳：国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而且在许多国家中增长缓慢；人均收入水平低下而且在许多国家中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呈高度偏态，占人口 20%的高收入阶层得到的收入高于占人口 40%的下层人民的 5～10 倍。

（三）沉重的人口压力

人口重负始终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典型特征。人口基数大，或人口增长率过高成为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世界人口超过 50 亿，其中 3/4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不足 1/4 的人口居住在发达国家。

（四）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性

这是发展中国家共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般而言，人们是从发展中国家既有传统的农业，又有现代化工业，既有广大落后的农村地区，又有相对发达的城市的角度说明二元经济的特点。以后又提出开放二元性经济，其特征是国内农业与工业并存，外贸则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对立，尖锐地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上。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解释是：按社会生产力的性质而言，既有传统的手工劳动，又有现代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劳动。按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言，既有自然经济或自给自足经济，又有简单商品经济以及现代商品经济。按生产发展规模和性质而言，它既有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又有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如果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即生产方式而言，它既有奴隶制或封建制生产，又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而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二元经济更可解释为：既有传统的私有制生产，又有现

代化的公有制生产。[①]并且在更多的情况下，“二元”也可表现为“多元”的复杂结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从实质上看，是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是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社会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已取得重大成就，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为代表的现代经济，有了一批由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型骨干企业和产业，甚至在一些领域里高新经济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国家的经济实力也获得了显著增长，综合国力上升到世界第六位，为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但是我国社会经济的社会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还很低，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产业和部门也是很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二元性经济结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发达国家也已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以便从质和量的规定性考察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和差异，对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面对多样化结构的、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分类又是一个十分复杂困难的问题。因为在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习俗、国土大小、人口多少、自然条件、资源状况、社会制度、经济水平都具有不同的条件和特色，而且

①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经济研究，1989（6）

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都在不断变化。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埃及等这样的人口大国，巴巴多斯和汤加那样的人口小国，富裕的海湾石油国，南美的海地和非洲内陆的最贫穷国家，具有悠久文明和独立历史的国家以及摆脱殖民统治不久而原来文化就不发达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之间，更是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异。所以，我们很难用一般性的指标来概括所有发展中国家。

目前，对发展中国家的分类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为了统计和实证分析的需要，建立起单一或几项全面衡量标准的分类体系。二是一些研究机构或学者针对某项研究目的而做的分类，如按人口分为大国或小国；按地理位置分为内陆国或沿海国；按历史文化传统分为不同文化教育传统、不同语言和民族性质、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商业习惯等类别；按工业化程度分为半工业化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以及按不同资源类型、政治结构或社会制度进行的分类等等。

在现有的国际机构中，处理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都要进行分类，其中以世界银行的分类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在世界银行所作的“世界发展指标”（WDI）分类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大致按三个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一）按照人均 GNP 分类。世界银行首先将各个国家（地区）按照人均 GNP 由低到高分为低收入国、中等收入国、高收入石油出口国、市场经济工业国和东欧原非市场经济国家五大类，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又细分为下中等国和上中等国两组。在这一分类中，发展中国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低收入国家，另一类是中等收入国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界发展基本指标

组　别	人均 GNP		年均通货膨胀率		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1988 年	成年文盲(%)	
	美元 1988 年	年均增长率 1965 ~ 1988 年	1865 ~ 1980 年	1980 ~ 1988 年		女性 1985 年	总计 1985 年
低收入国家	320	3.1	8.8	8.9	60	58	44
中国	330	5.4	0.1	4.9	70	45	31
其他低收入国家①	280	1.5	18.2	13.8	54	62	51
中等收入国家	1930	2.3	20.4	66.7	66	31	26
下中等收入国家	1380	2.6	21.7	80.8	65	32	27
上中等收入国家	3240	2.3	18.9	45.0	68	31	24
高收入国家	17080	2.3	7.9	4.9	76		
OECD	17470	2.3	7.7	4.7	76		
其他	8380	3.1	15.9	10.8	71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第 178 ~ 179 页。

（二）按地理位置分类。发展中国家按照地理分布划分为五个部分：(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 撒哈拉以南非洲。指除南非以外的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3) 欧洲、中东及北非。包括塞浦路斯、希腊、匈牙利、马耳他、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8个欧洲国家，以及所有北部非洲国家、中东国家和阿富汗；(4) 东亚。包括中国和泰国在内的亚洲东部、东南部和太平洋东部沿岸的所有低中收入国家。(5)南亚。包括孟加拉国、不丹、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三）特殊项目分类。主要包括三个组别：(1) 石油出口国。

①指不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其他低收入国家。

指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额占商品出口 30%以上的国家；(2)严重负债的国家。指已陷入严重的外债清偿困难的国家；(3)未向世界银行报告的非会员国。主要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概念形态上，人们最初是作为同义词交替地加以使用。发展经济学学者们以后愈来愈多地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商品量和劳务量的增长，即产出量的增长，常以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经济发展的涵义则要广泛得多，它不仅包括产出量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且还包括不发达经济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法律，甚至观念、习俗变革的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一个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些结构的变化可以从产出结构的变化反映出来。产出结构的变化是由投入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投入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指增加或淘汰投入物的生产或加工种类，这表明许多诸如新的制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机构、交通运输、现代通讯和政府管理等新的经济部门的出现和旧的经济部门的削弱或消失；另一方面它也包含着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或企业生产过程中，管理制度的改变。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变化，投入结构的变化是不可能的。然而，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需要选择新的工作和提高工作能力，这又导致教育结构的变化。并且随着劳动人口流向城市中新兴的经济部门，又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新的社

会阶层如教师、律师、医生、金融和商业机构中的职员、各种管理人员以及各种新产业工人等的出现。从经济上看，这些变化必然导致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利润的扩散朝着有利于收入分配平等的方向发展，这又会使过去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造成的萧条的国内市场转为购买力旺盛，从而进一步刺激产出的增长。从政治上看，这种变化能促进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主要是指一国经济结构、制度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它最表层的变化是产出结构的变化，这些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合力，推动产出量的增长。

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区别，我们可以体会到，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导致经济发展，因此衡量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并不能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准。如同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测定一国经济发展程度。因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中并没有区分生产和销售商品和劳务活动的净值以及在这些活动中投入物的消耗。因而也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即经济增长很快，但由于投入物占的比重很大，以致不可能有更多的收益去从事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再如国民收入也不可能测定一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即使排除国民收入不能衡量一国中各种结构性的变化，如果人口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或者与国民收入按相同比例增长，那么其结果便是人均收入下降或保持不变。这样，人作为经济增长的主体，在经济增长中并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另外，人均收入也不能成为测定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因为它并不能反映出一国收入分配的变化方向，一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很可能是少数上层阶级收入大幅度增加，而广大中下层群众收入却降低。究竟使用哪些指标可以科学地测定一国经济发展的程度，直到现在也没有统一认可的标准。为弥补这些缺陷，一些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主张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来补充或代替传统的衡量标准。这种指标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采取社会、

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标准或“最佳”的方法来衡量发展，另一种则用生活质量来衡量发展。实际上主张用一些非货币的社会指标来间接地衡量一国经济、社会等结构的变化程度，防止“有增长无发展”的倾向出现。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是，经济增长包含在经济发展之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因为，如果没有产出量的一定增长，一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失去物质基础，即“无增长便无发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包含在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应当是多结构、多样化的产出量的增长。因为，单一或少数产出的增长必然受到各种市场条件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单一化对其经济发展的阻碍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实际上，多结构产出量的增长本身就暗含着它是一国多方面结构变化的结果。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固然有着上述联系，但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联系是不会自动形成的。在发达国家，由于已经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发展，生产的社会化高度发达，各部门、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大体相当，即发达国家的结构是均质的，加上商业和金融事业发达，因此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会通过市场机制，自动传递到其他部门和地区，造成全面的经济发展。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口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的落后经济部门，少数先进生产部门多是与国外市场相联系的出口部门，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结构的非均质，已经造成经济增长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扩散的障碍，加之发展中国家缺乏经济增长扩散传递的市场机制，更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化滞缓。因此，发展中国家不能片面追求产出量的增长，应当通过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弥补市场

机制不足,重视促进各种结构的变化和结构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

三、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

由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规模，而人均 GNP 则是衡量不同国家相对发展水平的概要指标。因此，它们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基本趋势的通用指标。用于衡量发展水平的通用指标还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CDP）、国民生产净值（NNP）、国民收入以及发展速度、增长速度、平均增长速度等。

用人均 GNP、人均 GDP 或国民收入作为衡量发展水平有其缺陷，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它不能及时反映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类型，也不能说明由于使用这些产品和劳务而获得的福利大小，更不能说明增长过程中由于环境污染、城市化和人口增长所付出的社会代价。

其二，大量未通过市场的产品和劳务在 GNP 中得不到反映。

其三，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状况。

其四，各国的 GNP 一般是以各国货币按照汇率用美元计算的，而固定汇率往往定值过高或定值过低，如汇率浮动，只好用一年的平均值计算。无论哪一种情况，各国的 GNP 都难以作出真实的比较。

其五，与各国的相对物价结构差异很大，从而以美元折算的 GNP 在各国的实际购买力也差异很大，把 GNP 作国际比较，不易反映各国的实际生活水平。

其六，有些国家计算产值的方法不同，造成了把 GNP 作国际比较的另一重困难。例如，按照原苏联模式计划管理的国家一般用工农业总产值衡量，要结算这些国家的劳务价值就很不容易。这些国家是用毛值而非附加价值计算产值的，不免有重复计算之弊。长期以来，利息和地租不计算为产值，虽然现在已开始

计算，但并不能反映要素的稀缺价值。

其七，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的统计资料不完全、不准确。

尽管 GNP 等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有种种缺点，但仍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能够把国民经济的全部活动概括在极为简明的统计数字之中，从而可以成为衡量各国经济增长的通用指标。

衡量经济发展比衡量经济增长困难得多。一般认为，发展的中心意义是社会和个人福利的增进。因此，衡量发展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的指标：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识字率、健康水平和就业状况。如何建立综合性衡量发展的社会指标体系，以补充或替代传统的衡量体系，许多发展学者和一些国际研究机构作了努力。这方面的努力主要是沿着两个方向向前推进：一类是采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性指标来衡量发展；另一类是采取相对简单的衡量人的基本需要是否得以满足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来衡量发展。

（一）综合性发展指标体系

综合性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项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提出的 16 项综合发展指标和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和莫里斯的 40 个变量的指标体系。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

1.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2. 两万人以上的地区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3. 人均每日消费的动物蛋白质；
4. 中、小学注册人数总和；
5. 职业教育入学比例；
6. 每间居室平均住人数；
7. 每千人中读报人数；
8. 从事经济活动人口中使用电、水、煤气等的百分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9. 每个男性农业工人的农业产量；
10. 农业中成年劳动力的百分比；
11. 人均消费的电力的千瓦数；
12. 人均消费钢的 kg 数；
13. 能源消费（折合人均消费煤的 kg 数）；
14. 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
15. 人均对外贸易额（以 1960 年美元计算）；
16. 工薪收入者在整个从事经济活动人口中的百分比。

他们最初考察了 73 项指标，最后只从中选择了上述 16 项指标。其中一部分是社会指标，一部分是经济指标。指标的选择是根据是否和社会发展指数联系密切，利用联系密切程度得出加权数平均。人们发现，这种发展指数与各种单个的社会和经济指标的关系，要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这类指标的关系更密切。因此，一些国家按发展指数排列的次序与按人均国民总产值排列的次序不同。人们还发现，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展指数的关系，要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展指数之间的关系密切得多。得出的结论是，人均产值达到 500 美元(1960 年价格）时，社会发展速度要比经济发展速度快。

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Adelman ）和莫里斯(Morris) 提出的发展指数。它是根据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来衡量发展的。这项研究根据 40 个变量，对 74 个国家进行了分组，他们用因素分析法考察了社会和政治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现某些关键性因素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许多相关关系。

阿德尔曼和莫里斯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量：

1. 传统农业部门的大小；
2. 二元结构的程度；
3. 城市化的程度；

4. 基本社会组织的特点；
5. 当地中产阶级的地位；
6. 社会流动性的程度；
7. 识字率；
8. 大众传播媒介的水平；
9. 文化与种族的同质程度；
10. 社会紧张程度；
11. 自然人口生育率；
12. 观念现代化程度；
13. 国家一体化程度与民族团结意识；
14. 政治权利集中程度；
15. 民主制度的力量；
16. 政治上的反对派与出版自由程度；
17. 政党竞争程度；
18. 政党制度的主要基础；
19. 工人运动的实力；
20. 传统的上层人物的政治力量；
21. 武装力量的政治力量；
22. 政府机关的效率；
23. 领导层对经济发展（改革）的支持程度；
24. 政治稳定程度；
25. 196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6. 1950/1951～1963/1964年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27. 自然资源的蕴藏量大小；
28. 总投资率；
29. 工业现代化水平；
30. 1950年以来工业化程度的变化；

31. 农业组织的特点；
32. 农业技术现代化水平；
33. 1950 年以来农业生产率提高程度；
34. 物质资本是否充分；
35. 1950 年以来物质资本增加程度；
36. 税收体制的实际水平；
37. 1950 年以来税收体制的改进程度；
38. 财政体制的实际水平；
39. 人力资源的提高程度；
40. 对外贸易的结构。

人们对这些研究的主要批评是，他们是根据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根据人民的福利去衡量发展的过程的。他们的指标同样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必须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道路发展的假定。例如，他们使用的人均动物蛋白质消费指标和人均能源消费指标就是证明。有关政治民主、出版自由的标准则更是明显的带有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念的色彩。

此外，虽然预期寿命和识字率等产出项目才是真正的发展目标，但他们总是强调用诸如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或病床数以及入学人数比率等投入项目去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文教卫生状况。为了回答这些责难，有好几种研究都试图根据满足人口大多数的基本需要或根据其“生活质量”来建立衡量发展程度的综合发展指标。

（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

莫里斯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是由一些容易获得的、反映大多数人的不同基本需要的指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组成的简便的综合指数。每项指数都用 100 分制表示每个国家的成绩，“1”表示“最坏”，而“100”则表示“最佳”。预期寿命的上限 100 分定为 77 岁（瑞典 1973 年的预期寿命），下限 1 分定为 28 岁（几内亚比绍 1950 年的预期寿命）。各

国的预期寿命都在这上下限之间，从 1 到 100 评分。例如，预期寿命上限 77 岁和下限 28 岁之间的中点为 52 岁，就将 52 岁定为 50 分。与此类似，婴儿死亡率的上限为 9‰（瑞典 1973 年达到的数字），下限 279‰（加蓬 1950 年实际数字）识字率用 1～100 的百分比来衡量，可直接用百分制划分等级。一旦一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按百分制打出分来，用同样的权数平均，就可以计算出这个国家的综合指数 PQLI 来了。

虽然通过这项研究发现，人均国民生产值低的国家， PQLI 值也低，但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某些国家人均产值高，但 PQLI 值却很低，甚至低于最穷的各国平均值。而有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但 PQLT 值却比中上收入水平的各国的平均值还高。

第三节　经济发展思想的历史渊源

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之前，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已经有了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经济发展思想是与资本主义同步出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与成长，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并越来越重视生产力水平如何提高、社会财富如何增进、国民经济如何改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生产日益社会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或者积极地论证经济如何发展，或者消极地解释经济如何不发展。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和熊彼特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分析，被发展经济学家视为当代发展经济学可以上溯的思想渊源。

一、古典学派的经济发展思想

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给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启示最多的是古典学派。他们所谓的古典学派包括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马尔萨斯，直至约·斯·穆勒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照他们看来，古典学派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古典学派提出过的有关经济发展的八个问题，仍然是当代发展经济学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1）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和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的相对速度；（2）经济增长中农业的作用；（3）部门间贸易条件的重要性；（4）制约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国民收入职能分配长期趋势的力量；（5）利润转化为投资对资本积累的决定性作用；（6）资本在各个部门间的最佳配置；（7）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8）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亚当·斯密。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亚当·斯密无疑是把经济增长问题作为论证中心、作为分析的总题目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论证的焦点始终是经济增长问题，始终是什么因素促成国民财富的增加或减少。斯密所谓的财富明显地具有现代经济学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涵义。他最先提出了区别于总量生产概念的按人平均产量的概念。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和从事劳动的人数，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会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他看来，不论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增加生产性就业人数，都必须以资本积累作为物质条件。因此，斯密始终把储蓄和资本积累视为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分析曾经给初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形成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看法播下思想种子。在分析资本的作用时，斯密提出资本应该包括“所有居民既得的有用能力”。这一思想被视为当代发展经济学“人力资本”概念的起源。

——大卫·李嘉图。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不同于斯密的经济理论之处，在于他把国民财富研究的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而分配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李嘉图在十分强调分配问题的重要性时，绝未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问

题，他是从生产的变动中去观察分配问题的。李嘉图对经济增长的看法和斯密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数量的扩大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资本积累的扩大是使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成为设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的基础。

——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以收益递减律为基础的。他认为，人口的不断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虽然从短期看，工人和人均食物供应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增加，但这又会导致人口增长的加速。因而从长期看，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的产量因受收益递减律的制约，只会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人口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以及人均消费的减少，从而产生贫困化。他还提出了因消费不足而引起经济停滞的理论。当代发展经济学家以他的人口理论为基础，提出“人口陷阱”理论，认为人口过度增长是发展中国家不易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原因。发展经济学家还肯定了在技术不变条件下马尔萨斯理论在农业生产中的适用性。

——约·斯·穆勒。穆勒对经济增长问题，作了一些特殊论证。他集中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投入要素价格的影响。他把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逐个地作为变化条件来观察对投入要素价格升降所起的作用，这正是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常用的分析方法。

——李斯特。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第一个明确地以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对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过程。这个转变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1) 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及其掌握的科技知识，包括对劳动的态度和价值观念。(2) 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包括公共基础设施；(3)各种社会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